



# 考古学视角下的秦汉家庭与日常生活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刘尊志 主编



科学出版社

# 考古学视角下的秦汉家庭与日常生活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刘尊志 主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 内 容 简 介

秦汉时代有着长时间的繁荣和统一,日常家庭和生活的内容、形式等都得到极大的拓展和丰富,各种生活习惯和社会风俗也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内涵丰富的考古发掘资料为研究秦汉时期的家庭生活和日常活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本书通过整理相关的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尝试揭露秦汉时期家庭和日常生活的内容、内涵,为研究社会史、物质文化史做出有益的尝试。

本书适合文物考古相关专业师生及研究人员,以及对秦汉历史文化感兴趣的社会人士阅读。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考古学视角下的秦汉家庭与日常生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刘尊志主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10  
ISBN 978-7-03-062595-3

I. ①考… II. ①刘… III. ①古代生活用具—考古—中国—秦汉时代—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K875.2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24424号

责任编辑:张亚娜 郑佐一 / 责任校对:邹慧卿

责任印制:肖 兴 / 封面设计:图阅盛世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9年10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9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3

字数:530 000

定价:19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 “考古视角下的秦汉家庭与日常生活”学术研讨会

主办单位：南开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南开大学中国史研究中心

日本研究中心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庭与日常生活的考古学观察”

（16JJD770028）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本书出版得到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资助

## 序

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办的“考古学视角下的秦汉家庭与日常生活”学术研讨会于2018年7月7—8日在南开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中国国家博物馆、河南博物院、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天津博物馆、徐州博物馆、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郑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洛阳师范学院等国内众多科研院所、博物馆、高等院校的三十多位专家学者共同出席了研讨会。

在会议发言中，与会学者从多个角度对考古学视角下秦汉家庭与日常生活研究的学术意义进行了阐述。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常建华教授认为，生活史的研究可以深化我们对古代社会结构、社会性质等的认识，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发展需要关注多学科研究，历史研究尤其是社会史研究应与考古资料结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白云翔教授分析了古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现状，提出考古学研究需要重视社会生活，在开展社会生活史研究的过程中，考古学存在自身的优势，也有与之相关的内容和方法，并指出今后应加强这方面的理论思考和体系化建设，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与日俱增的考古材料，将社会生活史研究继续推向前进。徐州博物馆李银德研究员从考古学的角度论述了秦汉家庭与日常生活的一些内容，指出与秦汉社会生活相关的考古发现、研究已十分丰富，利用考古材料进行社会史研究前景广阔，既能够补充文献记载的不足，也可以更直观、深入地认识该时期家庭与日常生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瑞认为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契机下提出秦汉家庭与日常生活这一概念，对今后秦汉考古的发展将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改革开放带来了人们生活上巨变以及考古学事业的发展，加深了我们对秦汉家庭与日常生活的理解，使我们能够在之前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上做更多的扩展，发现更多的角度。还有很多的学者提出了真知灼见，对今后开展秦汉家庭与日常生活的考古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意义。

本次会议，各位专家学者以考古学的角度对秦汉家庭与日常生活进行了详细的专题解读，提交的论文涵盖秦汉家庭与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与会学者从秦汉时期社会生活的视角出发，审视、收集、整理、分析、研究各种考古资料，就社会生活进行考古学研究，探讨秦汉家庭与日常生活、生产与消费、服章与器用、城市与墓葬等相关问题，材料全面、内容丰富、研究深入。

会议为期两天，研讨气氛热烈，参会人员以中青年教授、研究员为主，也包括博士、硕士研究生等青年力量，是一场以中青年学者为主、层次较高的学术研讨会，这次研讨会深化了秦汉家庭与日常生活的考古学研究，提出了“社会生活的考古学研究”这一命题，将以往的零星研究纳入了一个大的研究方向，不仅对进一步完善考古学的学科建设、充分发挥考古学的史学功能、推动中国考古学与社会史的综合研究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对于真正“让文物活起来”、讲好物质文化遗产背后的故事等倡议，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因此特将会议发言与论文结集出版，以期全面展示本次会议的内容与成果，并为今后系统开展社会生活的考古学研究、拓宽考古学研究思路发挥一定的参考与引导作用。

在此向参加本次会议和提交会议论文的诸位专家学者致以诚挚的感谢，也希望家庭与日常生活乃至社会生活的考古学研究在诸位师友的帮助和推动下能够不断深入，多出成果。在会议召开及论文集编纂过程中，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常建华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刘毅教授均给予诸多帮助。论文集的出版得到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资助，在此向二位老师及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表示由衷的感谢！论文集的编纂、出版过程中，常乐、谢佳芮等博士研究生及科学出版社的张亚娜、郑佐一女士均付出很多劳动。在此对参与本次论文集编纂、出版的同学与工作人员亦表示诚挚的感谢！

是为序。

刘尊志

2019年5月1日于南开大学津南校区

# 目 录

## 一 家庭与社会、日常生活考古学研究的思考与建议

|                                    |        |
|------------------------------------|--------|
| 关于社会生活的考古学研究及其初步思考·····            | ( 3 )  |
| 关于秦汉家庭与社会、日常生活考古学研究的讨论与建议(发言)····· | ( 17 ) |

## 二 家庭与日常生活

|                      |        |
|----------------------|--------|
| 考古所见汉代人的卫生习惯·····    | ( 35 ) |
| 汉画像石中儿童形象及其作用简析····· | ( 50 ) |
| 浅谈考古学视角下的家庭教育·····   | ( 64 ) |
| 两汉蹴鞠发展状况探讨·····      | ( 74 ) |
| 北朝时期卤簿相关问题探讨·····    | ( 89 ) |

## 三 生产与消费

|                                   |         |
|-----------------------------------|---------|
| 试论秦的矿业分类与管理——以相家巷封泥为主·····        | ( 105 ) |
| 秦汉时期的燃料供应与日常生活——以木炭与薪柴为中心的探讨····· | ( 112 ) |
| 汉代农作物的考古发现与认识·····                | ( 124 ) |
| 汉代家鸡饲养与消费的考古学观察·····              | ( 133 ) |

## 四 服章与器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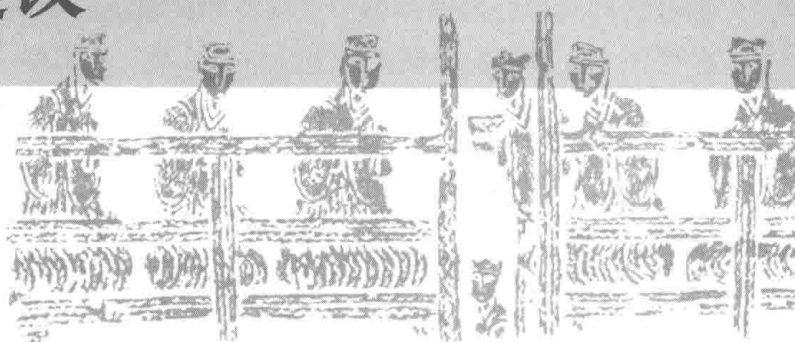
|                        |         |
|------------------------|---------|
| 汉代服饰基本形式的考古学观察·····    | ( 155 ) |
| 考古视野下的汉代日常生活服饰·····    | ( 165 ) |
| 汉代舞服的考古学研究·····        | ( 176 ) |
| 图像中的汉代生活用玉·····        | ( 196 ) |
| 秦汉时期铜器功能的转变及其原因探析····· | ( 214 ) |
| 汉代青铜泥筩研究·····          | ( 223 ) |

|                               |         |
|-------------------------------|---------|
| 汉代的财富观念与符号表达——以铜器上的钱纹为中心····· | ( 249 ) |
| 东汉神仙画像镜香炉图像考辨·····            | ( 257 ) |

## 五 城市与墓葬

|                                    |         |
|------------------------------------|---------|
| 西汉长安城的规模问题·····                    | ( 269 ) |
| 汉都长安的水循环·····                      | ( 283 ) |
| 秦始皇的后花园——秦始皇陵苑囿类外藏坑研究·····         | ( 293 ) |
| 试论汉代诸侯王墓地中“一王二后”的布局·····           | ( 308 ) |
| 洛阳东汉墓出土韩君残碑浅析——兼谈汉代墓碑流行的时间与路线····· | ( 333 ) |
| 略论汉画像石题记的文化功能与属性·····              | ( 342 ) |
| 楚文化与汉画像艺术关系探析·····                 | ( 353 ) |

# 一 家庭与社会、日常生活考古学研究的思考与建议





# 关于社会生活的考古学研究及其初步思考

白云翔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社会生活”作为一个学术术语，是社会学的概念，一般认为是指人类社会的生活系统，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社会生活，“是指整个社会物质的和精神的活动”；狭义上的社会生活，则是指“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组织的公共活动领域以外的社会日常生活”<sup>[1]</sup>。换言之，狭义的社会生活是指广义的社会生活中与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相对应的社会生活，也就是社会日常生活。

这里所说的社会生活，即狭义上的社会生活，也就是社会日常生活。从研究的实践看，社会生活的内涵是清楚的，但其外延往往因研究者和研究视角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同时，它与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也难以截然分开。但无论如何，社会生活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基本组成部分。

正因为如此，在史学界，社会生活史作为社会史的一部分而成为历史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或分支学科，甚至已经成为一个史学流派。从世界范围来看，法国史学界年鉴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即1929年《经济和社会史年鉴》杂志的创办、1946年更名为《经济·社会·文化年鉴》以及后来一系列研究成果，对包括社会生活史在内的社会史研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德国和意大利兴起了“日常生活史学”研究，甚至被称为史学发展的“标志性”事件<sup>[2]</sup>，并对其他国家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在我国，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可以上溯到1911年张亮采《中国风俗史》的出版。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学术界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的广泛关注，成为当时“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的学术现象”。20世纪50年代以后，经历了一个曲折而缓慢的发展过程。

---

[1] 《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社会生活”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第320页。

[2] 刘新成：《日常生活史：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光明日报》2006年2月14日第12版“理论周刊”。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1986年10月首届“中国社会史学术研讨会”(社会生活是其重要的讨论议题)在南开大学的召开和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十卷本)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等为标志,我国的社会生活史研究走向全面复兴,并且学术成果累累,逐步成为我国史学研究一个热点和新的生长点<sup>[1]</sup>。在当今历史学界,社会生活史研究呈方兴未艾之势,已经成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史学学科分支。

在我国考古学界,“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考古学开始步入转型的阶段。所谓转型,就是考古学研究的重心由前述的以年代学为主的文化史研究占主导地位,逐渐向全面研究古代社会的方面转变”<sup>[2]</sup>。既然是全面研究古代社会,自然包括社会生活方面的研究。新世纪以来,考古学研究“透物见人”的学术理念被广泛接受。在关注和研究物质遗存本身的同时,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物质遗存所反映的社会、人和人的活动等方面。

正是在上述学术背景之下,这里提出“社会生活的考古学”这一命题,并就相关问题略作思考和讨论。

需要说明的是,近百年来,史学界关于社会生活史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最初主要是就社会风俗制度史等进行研究,同时也开始使用“社会生活”的概念<sup>[3]</sup>;后来,又出现了“日常生活”的概念及其使用<sup>[4]</sup>,但更多的是将其作为社会史的一部分,并称之为“社会生活史”;新世纪以来,有不少历史学者更倾向于使用“日常生活史”的概念和提法<sup>[5]</sup>。在笔者看来,尽管“社会生活”主要指的是“社会日常生活”,但使用“社会生活”的概念似乎更有利于理论的思考、研究的实践和体系的建设。因此,这里仍然使用“社会生活”这一概念,与社会史研究中的“日常生活”大致相对应。

---

[1] 彭卫:《近五十年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研究述评》,《汉代社会风尚研究》,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188—209页。

[2] 《考古学概论》编写组编:《考古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76页。

[3] 郭沫若:《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45年,第23—74页;傅安华:《唐代社会生活一斑》,《傅安华史学论文集》,黄山书社,2010年。

[4] 陈直:《汉代人民的日常生活》,《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陈如:《汉代戍卒的日常生活》,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

[5] 常建华:《从社会生活到日常生活——中国社会史研究再出发》,《人民日报》2011年3月31日第7版“理论”。

## 二

考古学作为历史科学的一个学科，其性质和任务是根据实物资料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及其发展规律，与文献史学一起构成古代史研究的“车之两轮”“鸟之两翼”。

众所周知，“史前考古学承担了究明史前时代人类历史的全部责任，而历史考古学则可以与历史学分工合作，相辅相成，共同究明历史时代人类社会的历史”<sup>[1]</sup>。就史前考古学来说，“究明史前时代人类历史的全部责任”中，毫无疑问地包括史前时代的社会生活。就历史考古学来说，更是“主要任务和研究的重点发生转移，即转移到物质文化的研究、精神文化的物化研究和社会生活的具象化、实证化研究”<sup>[2]</sup>。因此，古代社会生活是考古学的重要研究领域，是毫无疑问的。

实际上，自20世纪20年代近代考古学在中国诞生之日起，就包含了对古代社会生活的发现、研究和揭示，试举数例<sup>[3]</sup>。1921年仰韶村遗址的发掘和史前彩陶的发现，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当时的日常生活用陶器及其类型和特征。1928年开始的安阳殷墟遗址的发掘和一系列发现，从多个侧面展现了当时人们从居住、储藏、饮食、车马、文字到祭祀、埋葬等聚族而居、聚族而葬的日常生活方式和丧葬习俗。1954—1957年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比较完整地揭露出一处仰韶文化的聚落，比较清晰地再现了6000多年前氏族公社时期一个氏族聚落的布局、结构、内涵以及从居住、饮食、人体装饰、娱乐等日常生活到丧葬活动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1956年以来西安汉长安城遗址的发掘，发现了大量有关社会生活的遗迹和遗物，为研究当时长安城居民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各种珍贵的实物资料。在某种意义上，任何一次考古调查和发掘活动，都会不同程度地为当时社会生活的研究提供新的实物资料。也正是基于丰富多样、与日俱增的考古发现及近代考古学发展的必然要求，史前时代到历史时代社会生活的若干方面都程度不同地进行了考古学研究，并且不断取得成果，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更是成果丰硕。当然，既往的很多研究虽然与古代社会生活直接相关，但当时更多的是着眼于物质文化而不是社会生活，此不赘述。

毋庸讳言，囿于我国考古学发展的时代局限性，社会生活的考古学研究长期未能受到应有的关注和重视，更缺乏理论的思考和体系化建设。正如我国古代史研究长期

[1] 夏鼐、王仲殊：《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17页。

[2] 白云翔：《历史考古学重在何为》，《美好中华——近二十年考古成果展》，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2页。

[3] 考古杂志社编：《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关注中国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以及汉民族形成“五朵金花”一样，我国考古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关注的重点是考古学文化及其年代和分期、史前及夏商文化谱系构建、古史重建、物质文化史研究等方面——这当然是必要的，也是学科发展的阶段性所决定的，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了“从物质文化史研究向古代社会复原研究的转型”<sup>[1]</sup>。古代社会复原研究自然包括古代社会生活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很多考古学研究也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古代的社会生活，如饮食生活、服饰生活、车马出行、文体娱乐活动等。譬如，黄展岳利用大量考古资料，对汉代人的饮食生活进行复原和勾勒<sup>[2]</sup>。又如，杨泓的《逝去的风韵——杨泓谈文物》中，根据考古资料和出土文物考察古代日常生活的16篇短文，构成了该书的“生活”篇<sup>[3]</sup>；孙机的《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sup>[4]</sup>，虽然名为“物质文化”，但实际上对汉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进行了简明而系统的考察。再如，汉代车马的研究，无疑属于物质文化研究的范畴，但同样也是社会生活研究的范畴，练春海的《汉代车马形象研究——以御礼为中心》，其内容已经不仅仅是从汉画图像上对汉代车马的研究，而是从车容扩展到车仪及卤簿等，实际上是车马形象、车马出行及其礼仪的研究，更接近社会生活史了<sup>[5]</sup>。也就是说，迄今很多物质文化的研究，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物质文化本身，而是开始多层次、多角度地进行解读和阐释。当然，以往的研究仍然主要着眼于物质文化而非社会生活。尽管物质文化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但物质文化研究并不等同于社会生活研究。但毋庸置疑的是，物质文化研究的长期积累，为社会生活的考古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在史学界社会生活史研究方兴未艾、考古学学科建设不断完善、考古学研究逐步向古代社会复原研究转型、“透物见人”的学术理念被广泛接受的今天，提出并系统开展“社会生活的考古学研究”，或者简称为“社会生活考古”，应该是时候了。这不仅对于进一步完善考古学的学科建设、充分发挥考古学的史学功能、更好地实现考古学的最终目标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对于真正“让文物活起来”、讲好物质文化遗产背后的故事等，也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1] 赵辉：《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过去和现在》，《江汉考古》2018年第1期。

[2] 黄展岳：《汉代人的饮食生活》，《农业考古》1982年第1期。

[3] 杨泓：《逝去的风韵——杨泓谈文物》，中华书局，2007年。

[4]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2008年。

[5] 练春海：《汉代车马形象研究——以御礼为中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 三

社会生活考古不仅是必须的和必要的，而且在古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上，考古学有着其独特的优势。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考古资料的相当一部分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物质遗留，或者是与社会生活直接相关的物质遗留。尽管考古资料涉及古代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但社会生活的物质遗存至少占有半壁江山。譬如，城址、聚落、居住址以及模型明器中的宅院、房屋等，都与人们的居住生活直接相关；灶址、炊煮和饮食器具、炉灶模型明器以及动植物等食物遗存等，都是人们饮食生活的直接反映；各种纺织品和衣物遗存、带钩、带扣、革带以及各种图像资料中的服饰，都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服饰；头饰、耳饰、项饰、胸饰、钏、指环以及梳、篦、簪等，都是当时装饰生活及观念的反映；各种车、马遗存及模型明器，各种图像资料中的交通工具及出行等图像，都是当时交通和出行生活的写照；医疗器具、医疗图像乃至人骨上的医疗创伤等，都是病患与医疗生活的反映；有关百戏、杂技、体育活动的图像资料和模型明器资料，形象地反映出当时的文体娱乐活动；各种墓葬资料，则是当时人们丧葬观念和丧葬活动的物质遗留。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不仅任何一种考古资料都会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生活，而且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角落在考古学上都有所反映。

另一方面，考古发现的古代物质遗存都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实证性和具象性特征。因为，考古发现的遗迹和遗物都是当时的人们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和遗迹现象，没有经过后来人为的加工和改动（经过后人加工和改动过的情况也是可以辨别出来的），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原状”“原貌”“原生态”；它们有着明确的时间和空间定位，甚至还保留着某种程度的应用场景，有的还能具体到某一类人或某一种活动；无论考古遗迹还是考古遗物，都是直观的、具象的客观存在。正因为如此，有学者根据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现的房屋或居室内埋葬死者的现象，考察了兴隆洼文化的居室葬俗及相关问题<sup>[1]</sup>；有学者根据新石器时代墓葬中有意用破碎器物随葬的现象，就我国史前时期的“碎物葬”这种特殊的丧葬习俗及其辟邪和死者享用兼而有之的含义等进行了考察<sup>[2]</sup>。又如，有学者根据考古发现并结合文献记载，讨论了东周时期主要流行于吴越和戎狄地区的“被发”这种有别于中原地区的发式系统<sup>[3]</sup>，还就东周时期女性的发型和发式进行了考察<sup>[4]</sup>。再如，

[1] 杨虎、刘国祥：《兴隆洼文化居室葬俗及相关问题探讨》，《考古》1997年第1期。

[2] 黄卫东：《史前碎物葬》，《中原文物》2003年第2期。

[3] 王方：《东周时期“被发”的考古学解读》，《东南文化》2010年第5期。

[4] 王方：《东周女性发型发饰初论》，《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3期。